



一本书的社会史

文 / 何明星

2004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，第一堂专业课就是童庆炳先生的文论课，讲的是《文心雕龙》。当时童先生已过古稀之龄，带着20多名文艺学专业的博士们，从头开始一字一句地阅读这本书。文艺学专业，开一门古代文论课本无可厚非，但当第一堂课结束时，童先生跟大家说《文心雕龙》这本书他已讲了十五年之后，我不禁振颤了一下：掂了掂手里这本书，开始感觉到它的重量。

是什么力量决定了 一本书的生命力？

一本书的生命力，可能更多地体现在流传的历程与轨迹之中，一本书的流传史就是它的社会史。从刘勰写完这本书开始流传至今，传承到我的手里，它至少经过了大约1400多年。据我所知，刘勰是在一座庙里，伴着青灯黄卷写完这部书稿的。但无由通达之路，于是扮作买书人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待当时做大官的沈约经过，期望经由大名于当世的沈约推荐而在社会上广为传播。沈约不负刘勰之望，也慧眼识珠。但当终于如愿以偿之时，刘勰早已离开人世了。

公元1899年，甘肃敦煌发现了《文心雕龙》唐写本。唐写本《文心雕龙》是被一名叫斯坦因·奥雷尔的英国人从敦煌盗至国外，今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。这个史实的发现表明该书经由沈约的推荐已经进入主流传播系统。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播系统呢？无由得知。

元代一位郡首刊印了《文心雕龙》，至此才结束了写本流传的历史，这就是“龙学”史上的至正本。1984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现存于上海图书馆的

元至正本《文心雕龙》，这是最为珍贵的孤本。正本前有一个名为钱惟善的人写的《序》：“嘉兴郡守刘侯贞家多藏书，其书皆先御史节斋先生手录，侯欲广其传，思与学者共之，刊梓郡痒，令余序其首……至正十五年龙集乙未，秋八月，曲江钱惟善。”

我最感兴趣的是《序》中的信息，一部论述文学批评的论著，被一位郡守收藏事件背后的意义。而学界通常都认为，元代是中国文化最为荒凉的时代，刻印图书是花费十分巨大的事情。历史上并没有文字记载该郡守的身份是一位文学家，及其出于何种目的而收藏《文心雕龙》，但可以推定，中国典籍的收藏与流传一定是沿着自己的一条河流涌动着，只是目前我们了解的还不确切。

到了明代，一批有钱有势的文人、一大批学者官僚收藏校勘《文心雕龙》。比如明代著名版本是梅庆生的《文心雕龙音注》，堪为明代“龙学”研究的集大成者。据日本学者考证，梅庆生从万历三十七年开始一直到天启六年，前后二十余年时间，关注《文心雕龙》的校勘和研究，因此明代《文心雕龙音注》的学术水平很高。该版本在卷首开列了参与校勘的一大串名单，除杨慎（字用修）作过《文心雕龙》的点评外，其他30人据考证，有的是当时的文坛名人，有的是爱好诗文的官僚，名声大小不一，所处地域分别是今天的江苏、福建和江西等地。其中有一名为谢兆申（字耳伯）的福建人，是刻印《文心雕龙》的主要

出资者。在《四库提要》的跋语上记载：“明谢兆申字耳伯，福建邵武人，倜傥好奇，每岁必游吴岳，喜交异人、购异书，摭拾异闻异见，人自荐绅学士子墨客卿黄冠缙流靡不接；书中坟典丘索经纬流略稗官琐语靡不收。名山奇壑，足迹几遍。囊中金半以佞佛、半以市书。游吴师事刘子威，尤与临川汤显祖、竟陵锤惺、谭元春善。出入载书以随，客死麻城，书留僧舍，久遂散失。”可见谢耳伯是一个性情中人，游历甚广，交游广泛。只要有钱都用来购置各种书籍，用钱刻写《文心雕龙》自然是出于对这部旷世之作的景仰，是一种自发的文化选择，虽然身后客死异乡是一件悲凉的事情，但通过资助《文心雕龙音注》的刊刻而名垂青史，地下灵魂也足可安息。

到了清代，参与《文心雕龙》版本校勘的学者众多，并且是以官府组织的集体形式来研究，最著名的版本是黄叔琳的《文心雕龙辑注》和纪昀的《评文心雕龙》，其中的学者有何焯、郝懿行、卢文昭、冯舒、顾广圻、孙冶让、纪昀等。他们熟谙小学，广涉四部，并且专精于古籍校勘、注释，学术根基深厚，学术意识自觉，古籍整理经验丰富，在中国学术历史上均是划时代的人物。清代《文心雕龙》的研究是一种国家意识，与元、明两代的民间、自发性个体研究相比，有着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。

时至21世纪的今天，《文心雕龙》的注本、释本不下几百种。不仅如此，它也成为中国大学、研究生课程里必读的

经典，更有童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地讲授与参读。

我一边跟着童先生一字一句阅读《文心雕龙》，一边开始了我的思索：为什么《文心雕龙》这本书从诞生开始即有了生命，能够流传千年，但有的则刚面世就“死亡”？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一本书的生命力？

于是，我长久地沿着这个方向去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并痴迷于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传播历程，希冀从中找出蛛丝马迹。我曾背着一本万曼先生的《唐集叙录》从北京到伦敦，参加2006年国际书展，之后在英伦三岛观光的大巴车里，在苏格兰酒店的木床上，甚至为了不打搅同事的睡梦，我躲在洗手间里借助昏暗的灯光，找寻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著述流传至今的力量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发现唐诗结成文集大部分是在宋代，尤其是南宋时期发达的坊刻、官刻，还有一些水平较高的士大夫刻书，误以为是图书出版的力量传承了这些璀璨的中华文化经典，为身在出版界的自己找到了传承文化使命的崇高感。然而当我借助四川大学祝尚书先生的《宋人别集叙录》，梳理完苏轼、欧阳修、黄庭坚、王安石、陆游、朱熹等诗文集的流传历程时，发现那些专以刻书牟利的坊刻却是个“捣乱者”，不仅张冠李戴，把假托苏轼之名的诗当成苏轼的大作来买，迷惑了很多人。连当时的大学者陈振孙都承认：“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，惟《大全》《备成》二集诗文最多，诚如所言，真伪相半。”反倒是那些宋代名门望族的后裔，包括学生门徒、包括同里乡亲，有的尽管很穷，很困顿，但依然积攒资财，把祖先文集的刊刻与整理作为家族、作为同里的一件大事。宗族的力量往往使某本图书在湮灭几百年后又薪火相传。

显然，我自己高估了一本图书的生产、传播的力量，图书刻写、书稿校勘、甚至今天机械化印刷、数字出版、手机出版等图书专业出版机构固然重要，但没有作者，没有书稿，显然也谈不上图书的生命力。在图书生产到传播的文化

链条里，作者永远是龙头，永远是源头活水，就像没有李白、杜甫，哪里来的“李杜诗篇万古传”？

文字的刻写、校勘、印制乃至传播是有形的，有时就误以为这种有形的力量就是文化生命的全部，因此中国图书历史上的刻本搜集、编撰校勘、刻写乃至收藏都打上浓厚的社会印迹。

比如中国图书的竹简、雕版时代，图书使用范围基本限于皇权、贵族、士大夫等社会上层，内容主要是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、传达士大夫思想感情、记录最重要历史时刻等，使用的目的是“文书档案、历史纪录、私人信函以及与鬼神和后代子孙交流之用”。因为这种特殊的传播目的，图书与普通人的精神生活无缘。中国的历代政府都设有专门收集、管理、典藏和编撰出版图书的专业机构，在商代藏于宗庙，周代承殷商之制，也设天府等宗庙性质的机构专门收藏、保管盟约、大事记等典籍，先秦时期是一些史官代管，并由史官整理编撰，直到汉代，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专门机构和专门官职的出现。从东汉开始，编撰、出版和收藏、保管图书成为中国图书历史上一个蔚为大观的政治系统工程。在隋代，图书的保存是根据内容分级保存的。如将典籍分为上中下三品分藏各处，上品红玻璃轴，中品绀玻璃轴，下品漆轴。“窗户、床褥、櫺幔，咸极珍丽。每三间开方户，垂锦幔，上有二飞仙，户外地中施机发，帝幸书室，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，则飞仙下，收幔而上，户扉及櫺扉皆自启，帝出，则复闭如故”（转引自李致忠的《中国典籍史》上海人民出版社，第303页）。这种通过国家政权赋予图书文字的符号象征功能，形成了中国近千年历史传统：历朝历代的修史文化，图书的政治价值被大大强化，时至今日仍然留存在现实生活中。

但是，不论是《永乐大典》还是《四库全书》，它至多是一种已有历史文献的修缮与整理，对于明清时代的文化创新反而不如唐诗宋词的时代，更无法与先秦诸子百家时代相比。有些学者采用批

评的视角揭示了明、清两代组织大批文人穷经皓首于故纸堆，是对一个时代思想精神的禁锢，其实是有道理的。

图书所具有的超越力量， 到底是什么？

一个时代的精神创造与文化追求，激励着这个时代的人们去用哪些文字、载体记录下这个时代的思想活动，这种记录就是包含图书出版在内的一种文化活动。不论是意气风发，还是萎靡沉沦，抑或是金戈铁马，只要这种时代精神活动的本质是与历史以往不同的真实存在，就是一种巨大创新。记录这个时代精神活动的不管是碑刻、竹帛，还是图书、期刊，抑或是声影媒介，都会获得一种生命永续存在的理由。这种精神活动，包含着人类一种超脱凡尘的主观努力与抗争，只要这种精神抗争所挥洒的生命光华足够灿烂，就足以彪炳史册。

而这种精神活动，常常与外在的载体并不紧密相关：并非是因为一本镶嵌了钻石的卷轴书就具有了永垂不朽的靈魂，也并非因为是九五之尊的钦点而就世代相传。正如《文心雕龙》的流传，大名于当世的沈约推荐固然起关键的作用，但只是一代而已。如果不是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思想价值，也无法让明代性情文人谢耳伯的慷慨解囊。一本图书的生命力，正如爱弥儿·涂尔干所说的，“今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，还有国家之外的更高力量，它们并不是稍纵即逝的，因为它们与任何既定政治群体的特殊条件无关，也不会与这一群体的命运有密切的联系。这些力量更普遍、更持久。我们确实可以说，它们的目标也是最普遍、最永恒、最高尚的。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，我们看到人们所追求的理想，已经摆脱了世界某一地区、某一人群的地域条件或民族条件，超越于所有特殊的事物，逐步达到一种普遍性”。

图书所具有的这种超越力量， 到底是什么？

回顾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流传史，

可以确定的，它首先是一种人生信仰。这种信仰的存在，把图书与人生紧密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图书文化传统。《左传》有一段妇孺皆知的话揭示了这种信仰的内涵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把著书立说当做立言，视为人生不朽之大业，并作为人生信仰来追求。这个信仰是中国几千年读书、写书、刻书历史中所形成的历史传统，是留给今人宝贵的思想遗产。

我们看到古人为一本图书的写作，经常是以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，写就一首传世诗作，构思一篇文章，祖孙三代人合力完成一本著作，蕴藏其中的是“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人生不朽之盛事”的人生理念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写到：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违牵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禁，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体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”，这段文字是中国图书著述的最好精神写照。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史学、文学经典产生于逆境之中。“文章憎命达”，成为中国知识阶层对精神产品生产规律的自觉认识，并内化为自己的人生实践之中。狱中著书、残而著书、落第著书、老而著书的事例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层出不穷，著述成为中国知识阶层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，将自己有限生命无限延续的唯一精神寄托。

除人所共知的司马迁外，后世还有大量的模仿者。如残而著书的西晋文学家、史学家、医学家皇甫谧（215—282年），少家贫，带经而农，人称“书淫”。博通百家之言，淡泊名利，屡召不致，刻意著述，史书称“轩冕未足为荣，贫贱不以为耻”。42岁患风痹之症，半身不遂，卧床不起，仍然手不释卷，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，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《针灸甲乙传》，此外，还有《帝王世纪》《年历》《高士传》《玄宴春秋》等著述留于后世。明代太监作家刘若愚，就以司马迁为榜样，也在

狱中写就《酌中志》，留下了大量的宫殿规制、内府职掌、内臣服佩、饮食风尚、内版书数等历史资料。今传的《明宫志》五卷直接选自《酌中志》一书。

正是立言不朽的著述理念，才使包含刘勰在内的一大批知识人，把著述看作自己有限生命的历史延续而倍加珍惜，淡漠财富，看轻显达，一切显贵与荣华在著述面前均一钱不值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的篇首就把著述为文提高与天地并生的高度：“文之为德也大矣，与天地并生者何哉？夫玄黄色杂，方圆体分，日月叠璧，以垂丽天之象；山川焕绮，以铺地之形，此盖道之文也”，这是中国知识人著述观的极好写照。

其次它是一种职业伦理。立言不朽的图书历史价值观，直接影响了著述、刊刻与收藏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职业伦理传统。在图书的刊刻、校勘、收藏方面，这种职业伦理导致了中国人刻书成为历史最稳定、质量最精良、学术价值最高的“家刻”传统，图书家藏成为版本最全、最精湛的一个私人藏书系统。家藏、家刻虽然在规模上可能次于官刻，但千年绵延不绝、并分散于千万个独立的学术与文化家族、科举家族之中，“家刻”、“家藏”，以血缘、宗族为传承纽带，成为中国图书几次浩劫之后文化复兴的母体和再生土壤。这些文化行为的背后，直接源于图书历史传承价值的清晰追求，并在中国图书历史上，留下了一个个个性鲜明人生轨迹。清代有著名的藏书家、刻书家叶德辉（1864—1927），他的《书林清话》《书林余话》，记载了宋、元、明等历代关于书籍印刷、出版、收藏、鉴赏等种种史迹，是中国古代出版研究的必读著作。他在“总论刻书之益”一章中列举了宋、明几位著名刻书家的事例，阐明“积金不如积书，积书不如积阴德”，“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，而又与积金无异，刻书也”，“其书终古不废，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灭”的刻书动机。叶德辉本人，也同样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实践者。他是湖南长沙人，清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进士，一生致力于古书收藏、

校勘和刊刻出版，“不以避兵为苦，而以还乡为乐”，“五十余年，未尝稍解”，终于以取得了“所以绍往哲之书，开后学之派别”的成就，筚路蓝缕之功，为后世的中国目录版本学研究奠定了基础。

当然，强调立言不朽的人生信仰，强调图书与人生不朽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校勘、刻书文化传统和职业伦理，并非忽略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环境。正如人不能脱离历史环境而存在一样，一本图书的诞生即带有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特色。刘勰在崇佛的魏晋时代，只能把自己精神世界放在寺院里安顿，才写出了《文心雕龙》这部旷世之作。今天的图书出版，也不再具有远古社会生活中的唯一信息传播媒介的显赫地位，在面临电视、报纸和杂志和网络等多样化竞争的媒体世界中，图书不会再也不会提高到人生的高度，而成为唯一精神寄托。尤其是商业化浪潮席卷一切的大背景下，中国出版业必须与资本为伍但又不能深陷在金钱的泥沼之中。然而鱼龙混杂、质量低劣的作品充斥市场，罕见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的作品，这种现象也是一切以金钱为衡量标尺的文化消费时代里的必然。

然而，图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载体之一没有变。从技术层面来讲，书的载体从最初的龟骨、竹简、纸张，到现在的电子载体，外部技术形态上不论有怎样的革新，都没有脱离人类精神活动的本质。精神产品的价值就在于，金钱是无法来衡量人类精神思想的原创性价值的。我们的祖先将图书这种精神属性与人生不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，并跨越了财富金钱、政治利达的现实欲求，形成了中国独特图书的历史价值观，它是我们超越文化资本时代局限的法宝。

显然，一本书的社会史出发，发现的是图书刻写、校勘、印制乃至传播这种有形的力量，不是图书生命力的根本，如果不从图书内容的创新方面用力，可能适得其反。一本图书的生命力源于一个时代精神追求的有无、高下，它往往与时代的物质发展水平无关，不是越富足，文化就一定越发达，而恐怕恰恰是相反。❏